

· 思想之旅书系 ·

分享

鲁迅

袁良骏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享鲁迅/袁良骏著. - 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 
1999.8

(思想之旅书系)

ISBN 7-5043-3253-4

I.分… II.袁… III.鲁迅著作-研究 IV.I210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7175 号

## 分 享 鲁 迅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:  | 袁良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: | 王 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: | 陈丹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: |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:  |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|
| 社 址:  | 北京复外大街2号(邮政编码 100866)      |
| 经 销: 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:  |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         |
| 开 本:  | 850×1168毫米 1/32            |
| 字 数:  | 180(千)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:  | 10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:  |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   |
| 印 数:  | 4 000册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:  | ISBN 7-5043-3253-4/B·85    |
| 定 价:  | 16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# 目 录

### 第 1 辑 宏观鲁迅

鲁迅的社会批评发微 / 3

鲁迅的接受美学观 / 16

鲁迅杂文的艺术技巧 / 44

再谈鲁迅杂文的艺术技巧问题 / 80

鲁迅的历史评价和鲁迅研究的健康  
倾向 / 115

### 第 2 辑 关于作品

从祥林嫂的悲剧看《祝福》的艺术  
成就 / 135

一曲艺术的凯歌  
——读《幸福的家庭》 / 143

老舍的《猫城记》和鲁迅的《阿 Q  
正传》 / 155

鲁迅、白先勇小说异同论 / 172

### 第3辑 鲁迅与名人

鲁迅与老舍 / 199

鲁迅和瞿秋白

——从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及其《序言》

说开去 / 204

略论鲁迅与梅兰芳 / 214

鲁迅和川岛 / 222

“二周失和”与现代文坛 / 234

鲁迅与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 / 240

### 第4辑 台港鲁迅论

走出政治阴影的台港鲁迅研究 / 247

台港文学史家的鲁迅论 / 264

台港作家、学人的鲁迅论 / 296

跋 / 322

第 1 辑

宏观鲁迅



## 鲁迅的社会批评发微

### —

作为一名立志挽救世道人心的社会改革家，鲁迅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到了不能忘情的程度。鲁迅不愧为出色的社会病理学家，在他的笔下，描写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中国病态社会，为人们留下了一幅又一幅怵目惊心、血肉淋漓的病理解剖图。鲁迅小说、散文特别是杂文中的这种“社会录像”，早已为人们所熟悉；到鲁迅作品中作“录像遨游”，往往带给人们无尽的兴味和深沉的思索。鲁迅书信不同于他的小说、杂文，它们并非为发表而作。惟其如此，从中人们往往能够更为逼真地看到鲁迅对社会病态的激忿情绪，看到他在小说、杂文中想说而没有说出或已说而没有说尽的许多精彩的言论。

鲁迅一向认为，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“黑色大

染缸”，正像在《两地书》中他对许广平说的那样：“中国大约太老了，社会上事无大小，都恶劣不堪，像一只黑色的染缸，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，都变成漆黑。”<sup>①</sup>直到晚年，鲁迅仍然一再重申这一观点。比如，在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的信中他即写道：“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‘名’，只要有新鲜的名目，便取来玩一通，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，便放开，另外又取一个。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，放下去，没有不乌黑的。譬如‘伟人’、‘教授’、‘学者’、‘名人’、‘作家’这些称呼，当初何尝不冠冕，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，一切无不如此。”<sup>②</sup>一个月后，在《偶感》一文中，他又写道：

每一新制度，新学术，新名词，传入中国，便如落在黑色染缸，立刻乌黑一团，化为济私助焰之具，……此弊不去，中国是无药可救的。<sup>③</sup>

那末，这个可怕的“黑色染缸”何以形成呢？鲁迅认为这正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恶果。因为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是最善于言行不符，名实不副，撒谎造谣，蝇营狗苟，假借大义，窃取美名的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自然出现了社会性的弄虚作假，巧立名目。外来的新鲜事物，先是极力排斥，妄图拒之于国门之外，待到排拒不成，便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，为我所用地放入“黑色染缸”，浸泡一番之后，便成为自己“济私助焰之具”了。比如照相术，本是人类一大发明，但中国人却用来拍烧香磕头，搞封建迷信；再如电的应用，以电刑代替旧刑具，虽不是中国人首

创，但在肆虐上却创下了“光辉的”纪录。就是中国自己的科学创造和发明，又何尝能免“黑色染缸”之祸？指南针不是我们发明的吗？外国拿去航海，而我们却拿来看“风水”，选择宅基和墓地。火药不也是我们发明的吗？外国拿去造枪弹、炮弹，而我们却用来造爆竹。如此等等。

假如说“黑色染缸”说主要是对反动统治者的揭露，那末，对于“国民劣根性”的针砭便主要是对大众的警钟了。鲁迅一向强调“立人”，认为“人立而万事举”。而几千年的黑暗专制统治，却把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奴隶、奴才，不能自立，更无法自主，恶性循环，中国便愈益愚昧落后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。

鲁迅曾经认真总结过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，这在他的小说、杂文中表现得很清楚。而在书信中，也同样有发人深省的表述。比如，在1925年3月的一封信中，他曾对许广平淡起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后革命形势和社会风气之日渐其坏，他说：“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，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，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。使奴才主持家政，那里会有好样子。最初的革命是排满，容易做到的，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，于是就不肯了。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，否则，无论是专制，是共和，是什么什么，招牌虽换，货色照旧，全不行的。”<sup>④</sup>

这样强调“改革国民性”，一度被人们认为是鲁迅前期的思想局限。但事实上，即使在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，他也并未放弃这个观点。比如，在《三闲集·铲共

大观》中，面对长沙民众争看共产党被害烈士的头颅和女尸的现实，鲁迅沉痛写道：“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，是我们中国现在（现在！不是超时代的）的民众，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，只要看‘头’和‘女尸’。只要有，无论谁的都有人看，拳匪之乱，清末党狱，民二，去年和今年，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，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。”<sup>⑤</sup>

在鲁迅看来，社会丑态、病态之所以层出不穷，一半因为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、寡廉鲜耻，一半即因为公众的愚昧落后，无以自立。而最为可怕的便是他们身上的奴隶主义与奴才哲学。民众长期的奴隶命运，不应由民众自己负责，这是长期专制统治的结果。但是，如果心安理得于这种奴隶命运，甚至讴歌这种命运，那末，他就从无辜的奴隶沦为可恶的、“万劫不复”的奴才了。而这种“奴性”，恰恰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国民中。这种“奴性”向两极发展：对上谄而对下骄。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，摇尾乞怜，而在下属面前则神气十足，不可一世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，开起小小的工厂来，对付工人更凶狠：“他的摆架子，恐怕比他的主子还十足，还可笑。”<sup>⑥</sup>

鲁迅后期身居上海，处于血火交织的残酷白色恐怖中，更对上海社会特别是上海文坛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入剖析。他曾有诗云：“廿年居上海，每日见中华。”（《赠邬其山》）所“见”者，即白色恐怖下上海（乃至全国）社会的种种病态特别是文坛的种种怪相。十里洋场的帮闲、

买办、西崽、胥吏、富商大贾、流氓地痞、虔婆暗娼……都一一摄入了鲁迅的镜头。至于文坛上各类人物的嘴脸，更是惟妙惟肖，毫发毕现。在鲁迅后期书信中，出现最多的要数“文氓”。鲁迅这样形容此辈特点：“另有文氓，恶劣无极，近有一些人，联合谓我之《南腔北调集》乃受日人万金而作，意在卖国，称为汉奸；又有不满于语堂者，竟在报上造谣，谓当福建独立时，曾秘密前去接洽。是真欲置我们于死地，这是我有生以来，未尝见此黑暗的。”<sup>⑦</sup>又曰：“此辈心凶笔弱，不能文战，便大施诬陷与中伤，又无效，于是就诅咒，真如三姑六婆，可鄙亦可恶也。”<sup>⑧</sup>

“文氓”的一个分支，即所谓“粪帚”文人。鲁迅写道：“吾乡之下劣无赖，与人打架，好用粪帚，足令勇士却步，张公资平之战法，实亦此类也。”<sup>⑨</sup>张资平本不过一黄色小说家，进一步堕落为“粪帚”文人，乃在他无端攻击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者黎烈文“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，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”。含血喷人，无中生有，无异用“粪帚”打人了。

## 二

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，鲁迅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：“说到‘为什么’做小说罢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‘启蒙主义’，以为必须是‘为人生’，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……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

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<sup>⑩</sup>这种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创作态度，必然伴随着对“社会批评”与“文明批评”的渴求与倡导。一本《两地书》，与其说是鲁迅、许广平的情书集，不如说是关于“社会批评”与“文明批评”的讨论集。鲁迅说：“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，中国即无希望，但正在准备毁坏者，目下也仿佛有人，只可惜数目太少。”<sup>⑪</sup>这里的“毁坏者”，就是敢于和善于向旧社会、旧文明发动袭击的人：“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，施行袭击，令其动摇，冀于将来万一之希望。”<sup>⑫</sup>

基于这种“袭击旧文明”的需要，除了充分利用《晨报》和《京报》的副刊，鲁迅和朋友先后创办了《语丝》和《莽原》。众所周知，《语丝》的主将和灵魂就是二周（周树人、周作人）兄弟。该刊是我国现代期刊史上第一个以刊登杂文、短文为主的杂志，在《发刊词》中即彰明较著地强调进行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思想批评”，整个刊物猛烈抨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、社会的腐败和陋劣以及大众思想的愚昧和麻木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。其文风，正如鲁迅所说：“任意而谈，无所顾忌，要催促新的产生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，则竭力加以排击。”<sup>⑬</sup>因此，它被北洋军阀所忌恨，创刊三年即遭到查封，不得不易地上海出版。

《语丝》创刊约半年，鲁迅又和未名社的一些青年朋友创办了《莽原》，开辟了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

的另一战场。其特色同样是“率性而言，凭心立论，忠于现实，望彼将来”<sup>④</sup>，对反动统治和落后思想施以猛烈袭击。但在创办之初，鲁迅却在信中向许广平倾诉了他的“苦衷”：

中国现今文坛(?)的状况，实在不佳，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。最缺少的是“文明批评”和“社会批评”，我之以《莽原》起哄，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，虽在割去敝舌之后，也还有人说话，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。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，也还是小说多。<sup>⑤</sup>

鲁迅以小说名世，但他却嫌当时小说稿子太多而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稿子却太少，这就足以说明，鲁迅对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重视程度，已经远在小说创作之上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看来，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对社会腐败、文明衰微的直接的抨击，小说在这方面就显得迂曲而乏力了。

鲁迅从1918年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随感录》算起，直到1936年去世前夕，他一直用杂文形式进行这种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，这可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韧性战争。1935年岁暮，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的《后记》中，鲁迅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统计：“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：我从在《新青年》上写《随感录》起，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，共历十八年，单是杂感，约有八十万字。后九年中的所写，比前九年多两倍；而这后九年中，

近三年所写的字数，等于前六年……”<sup>⑥</sup>事实上，鲁迅杂文的总字数，远不止此。如何看待鲁迅这个漫长的杂文创作历程？如何看待他留下的近二百万言的十七本杂文集？<sup>⑦</sup>已成了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。有人说它们是“骂人文选”；有人说它们是“生命浪费”；有人说它们“不是文学”；有人则说鲁迅后期专写它们是“江淹才尽”。不能不说，这都是一些不能成立的误解与偏见。从整体上说，鲁迅杂文不仅是文学，而且是有卓越技巧和永久生命的优秀文学。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支劲旅，也是世界现代散文的一束奇葩。它的那些代表作品，比起蒙田、培根、兰姆等世界级散文大师的名篇，一点也不逊色。而且，从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的角度说，鲁迅也恰恰借鉴、继承、发展了这些世界散文大师。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，就中国现代小说而言，也许不无损失；但是，他的杂文的丰收却弥补了这种损失。现代中国当然需要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那样的优秀小说，但同样需要（假如不说更需要）鲁迅那样的优秀杂文，二者是无法分出高低上下，也绝非互相排斥的。

### 三

鲁迅杂文之所以可贵，他那些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之所以精彩，当然离不开它们的及时和文采，它们不愧为“感应的神经”和“攻守的手足”；但更重要、更

根本的，则在它们的深刻性、哲理性。有人不了解这一点，他们以为鲁迅杂文仅就一时一事而发，时过境迁，时移势易，这些杂文无论当时多精彩，也都失去了存在价值，不足以继续流传了。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与皮相之谈。不错，一般的“社会批评”与“文明批评”也许随时光而流逝，鲁迅就很希望他的文字能随被针砭的社会病的灭亡而灭亡。但是，社会病态根深蒂固，病态社会更不容易轻易灭亡，因此“社会批评”与“文明批评”的生命力往往超出人们的估计，也往往超出作者自己的预期。鲁迅杂文正是这样。鲁迅杂文很少就事论事，而总是即小见大，由近及远，从眼前似乎十分平常的事件生发开去，从中升华出精辟的见解乃至永久的哲理。这里，我们不妨信手举几个例证。

中国的改革和前进，是鲁迅最为关心的课题。他对社会病态的针砭，总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。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他就大声疾呼：“我所怕的，是中国人要从‘世界人’中挤出。”因为“想在现今的世界上，协同生长，挣一地位，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，道德，品格，思想，才能够站得住脚”，而当时腐朽老大的中国和它的愚弱的国民，恰恰缺少这些要素<sup>⑧</sup>。但想要改革，推动中国前进，却比登天还难：“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”<sup>⑨</sup>而“改革者”的命运，则往往十分悲

惨：“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，倘于社会无涉，才可以作为‘废话’而存留，万一见效，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。”<sup>②</sup>因此，改革者必须既要有向社会陋习和恶势力战斗，以最大的牺牲精神、以血的代价换取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勇气，更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。鲁迅对中国改革的上述认识，至今看来仍然是尖锐、精辟、深刻、独到、发人深省的。

对中国官僚体制的弊端，特别是饱食终日、无所用心的官僚们办事效率之低，鲁迅也曾有人木三分的剖析。以他所在的旧教育部为例，那些肥头大耳的总长、次长们，并无意办教育，“十之九是意在‘当局’”。“教育”界的多如牛毛的问题，他们眼睁睁看着不去过问，不去解决，却安坐在他们的教育部里喝茶、抽烟、“看条陈”、做“当局”。假如您认真真去和这些官老爷谈教育，就只能是对牛弹琴，自讨没趣。鲁迅说他的“这一种学识，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，目睹一打以上总长，这才陆续地获得，轻易是不肯说的”<sup>③</sup>。这样一种独到见解，在鲁迅杂文中是并非个别的。

深刻、独到的极致，是引发出很多哲理性思考、哲理性名言。鲁迅虽然并非哲学家，并没写下什么哲学著作，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自成体系的<sup>④</sup>。因此，在他的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中，就经常出现言简意赅、耐人回味、高度睿智的哲理名言，从而使他的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比如，在谈到“先

觉”和“小人”时，他说：“先觉的人，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。”<sup>②</sup>在谈到谣言诽谤之类时，他说：“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以此成大事者，古来无有。”<sup>③</sup>在鞭挞“帮闲文人”时，他说：“帮闲，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，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，那自然也就是帮凶。但他的帮法，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，也没有血腥气的。”<sup>④</sup>又说：“世间只要有权门，一定有恶势力，有恶势力，就一定有二花脸，而且有二花脸艺术。”<sup>⑤</sup>举不胜举的哲理名言，都已经进入了经典名言的宝库，它们将永远闪射熠熠光彩。鲁迅的有些杂文，像《华盖集》中的《忽然想到》，像《华盖集续编》中的《无花的蔷薇》，像《而已集》中的《小杂感》，像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中的《半夏小集》等，通篇皆由一则又一则的哲理名言联缀而成，那更是让人百读不厌的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的上乘之作了。

哲理，自然蕴含着历史的规律。鲁迅一向认为：“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，洞若观火。”<sup>⑥</sup>正因为深明此义，加上他对中国历史的熟稔，在进行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时，鲁迅便往往能够古今交错，将今类古，以古鉴今，在对病态现实的剖析中渗透进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这使鲁迅的整个杂文无形中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厚重的历史，使他的批评更具历史的深刻性和社会发展的预测性。限于篇幅，我们无法充分论证鲁迅“社会批评”和“文明批评”的丰富内容，此文挂一漏万，仅意在